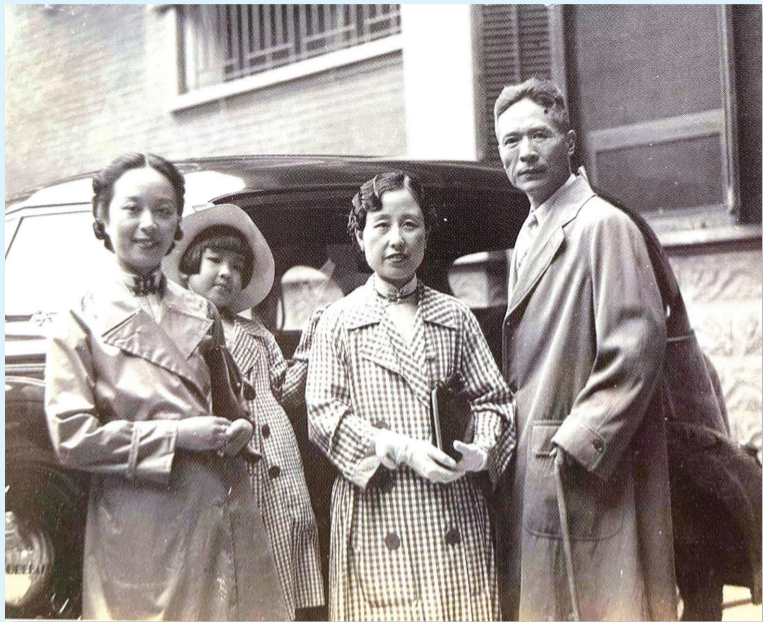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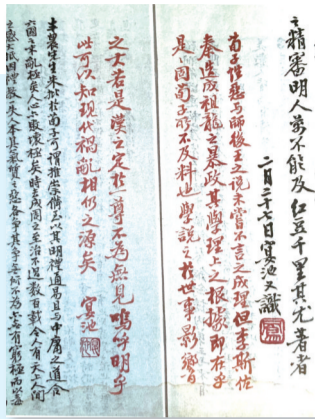


宴翁临抄明版《荀子》寻踪

◎王道



抗战时期,张元和、凌宣、贺启兰、凌宴池在汉口。



明版《荀子》,现藏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图书馆。



1892年,凌宴池出生于南通海门三阳镇,父亲凌见之先生作为地方乡绅,藏书不少,还把家宅修造成为小小园林,养殖了不少小动物,给子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响。

凌宴池本名霄凤,后多以字行。凌宴池有一个妹妹,凌海霞,为海门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位风云女子。

著名的合肥张家四姐妹与凌宴池夫妇皆有交集,甚至张家三婿沈从文与凌宴池还是文友。凌宴池就读于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,与老师、历史学家柳诒徵结下深厚友谊。柳诒徵对于历史、书法、版本学的研究直接影响了凌宴池。凌宴池从事的是银行工作,却热衷于书画收藏,其中钱沣的一幅楷书《荀子致仕》,字体雄强正派,直追颜书真身。

相信凌宴池在学问上是比较喜欢荀学的,凌宴池曾抄录明版《荀子》上的批注,这个做法似乎不是一位大藏家所为。

常熟市铁琴铜剑楼藏有明版世德堂的《荀子》,上有藏书家、校勘名家顾千里临前辈惠栋(松崖先生)批注,但是所书为行草,比较难以辨认,而凌宴池则以楷书临抄,为后来的校勘学打下了基础。

凌宴池的书法工整秀雅,颇有文徵明小楷的俊逸,因为张充和早年与凌家交往,甚至有人说张充和的小楷可能受了凌宴池的影响。此说姑存。

巧合的是,凌宴池所临抄的这部《荀子》就存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东亚图书馆,另外还有一部凌宴池题跋的《高邮耆旧诗余》同存该馆。须知张充和初到美国就在校图书馆就职,接触了大量的中文藏书,并为之书法题签。

根据凌宴池的临抄题跋,他是在“己丑年春二月”临抄的,应为1925年。这一年,铁琴铜剑楼所藏

的《四部丛刊》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由张元济主持影印。或许也正是此时,从北京调到上海,担任大陆银行行长的凌宴池得以借书临抄。令人吃惊的是,二十多册古籍,洋洋洒洒的批注,凌宴池居然只用了一天半就录毕。连他自己都自述:“穷一日有半之力,重临出之,虽目眩手酸,而心神怡悦,亦足以偿其劳矣。”

不只是临抄前人批注,凌宴池同时还对此书做了一点考据,他在书中发现了还有别人的识语,“弟(第)三与末(卷)有南阳石君识语”,南阳石君是谁呢?叶树廉,明末清初藏书家,洞庭东山叶氏后人,字石君,别号南阳穀道人。(惠栋本)原本外界似乎只知此书为惠栋与叶林宗所注,却不知此书还有另外二人所注。凌宴池在跋中说此书原藏于石君林宗两家,“惠校用墨朱笔疑是半农先生校语,内有树玉(钮匪石)语二条,乃非石山人笔也。”

“半农先生”则是惠栋之父惠士奇。惠士奇字天牧,号半农,人称“红豆先生”。而上述叶树廉则为叶林宗从弟。两位也都是古籍校勘名家。由此可为这部书更添分量。凌宴池称:“是数人皆为有清著名之学者,而所校正之处,竟有七百七十字之多,其反覆(复)校讐,历时甚久,学问淹博,殊不易及……”

凌宴池在临抄后多次作跋提及古书校对之功,并认为宋本“差落之夥”,明代之校本又不如清代,“红豆(惠士奇)、千里(顾广圻)”则为优秀的校勘名家。

对于荀子之说“人性本恶”,凌宴池也在后跋诠释:“荀子性恶与师后王说未尝不言之成理,但李斯佐秦造成祖龙之暴政,其学理上之根据即在于是,是固荀子所不及料也,学说之于世事影响之大,若是汉之定于一尊,不为未见,呜呼,明乎此可以知现代祸乱相仍之源矣!”

对于荀子学说,以及惠士奇的精彩批注,凌宴池也是抱着极其同情的笔触给予理解,并认为荀子之谆谆以礼教为言,与孔孟实有同心。只是身处于无药可救之境地,大盗至而言揖让,实有缓不济急之概。“自汉以后,其言治术不外孔孟黄老之学,故政虽专制,而民实自由,凡奴役人民竭民之力以殉上意者,皆目为暴虐无道。”

对于荀子之说的悲悯之心,凌宴池畅谈千古历史因缘循环之悲剧,“今世之象,恍如七国时旧剧之重演,秦制暗成时尚,学者更忘本逐末如醉如狂,不但荀子不可得,即杨墨亦何尝有之?则李斯之流也,其历史之循环,小者数百年,大者数千年而一周,非易理乎人也,抑天也,是不能不掩书而长太息者矣!”

回溯凌宴池抄录该书的年代,正是混乱时期的中国,33岁的凌宴池面对各种乱象,可谓忧虑之至。这一年,就连鲁迅也写出《忽然想到》,呼吁人们抛却旧有的儒学糟粕,先要生存。

此书现藏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东亚图书馆,上有“夕薰楼”“凤”“宴池”“凌宴池”等印章,皆为凌宴池自用印鉴。国内版本学者、古籍校勘名家师顾堂主人沈楠对于此本颇为肯定,但也有一个疑问,“此书据铁琴铜剑楼瞿氏藏本过录,然瞿藏本即顾千里原书。然凌录本有‘蔚案’等语,今顾本无。”是不是苏州王颂蔚曾过录顾千里批本?毕竟王颂蔚与常熟瞿氏也是世交。

而近代另一位校勘名家冒广生也曾于“庚辰十一月”,从瞿凤起处借临此书,并认为此书批注另有惠士奇、叶树廉之语,只是庚辰年应为1940年,比凌宴池晚了15年。

刘澹运盐河和徐家桥“掘沟”

◎陈灵

5月16日《江海晚报》在一版和三版报道了如皋徐家桥“掘沟”遗址考古消息,这确实是考古界在南通的又一重大发现,令人振奋。

近年来,南通市社科联、南通大学和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组织学者对南通大运河文化带、南通历史文化和江海文化等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,对南通古代的运盐河、“掘沟”、圆仁的如皋行程以及古代南通的城市形成等问题都有清楚的共识。

以我所掌握的南通历史地理知识来对照晚报两个版面的文章,觉得有两个问题应当弄清楚。

一是刘澹运盐河与徐家桥“掘沟”是两条不同的运河,“2200多年前,由吴王刘濞开凿的运盐河也有望‘重见天日’”,这个说法是错误的。

刘澹运盐河指老通扬运河中的扬州至海安段。海安以西的通扬运河段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过改造,部分河段拓宽、拔直,成为新通扬运河河段。然而,老通扬运河海安以西的河段还在发挥其作用。刘澹运盐河并没有湮没,也就谈不上什么“重见天日”。

“掘沟”原在今如皋市及如东县境内,西端与如皋城附近的运盐河相接,东端在今如东县城附近。“掘沟”的西段(如皋)与刘澹运盐河的东段(海安)直线距离最短约有19千米。刘澹运盐河西接大运河,而“掘沟”则是西接通扬运河的。刘澹运盐河与“掘沟”是两条不同的运河水道。

“掘沟”河名源自日本圆仁和的《入唐记》。圆仁说它是隋炀帝时开凿的,这个说法在学界是有争议的(在我看来这条运河极有可能是唐代开凿的)。晚报一版以“隋唐掘沟”相称,三版则以“隋炀帝时期掘沟”称之。两相比较,一版的说法较有弹性,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。

期望能在徐家桥以东发现一些古河道遗址,倘若能以点串线,则可以让隋唐时的掘沟“重见天日”。

二是圆仁与遣唐使团入唐时间应是唐开成三年(838年)。

晚报第三版的两篇文章对日本第18次遣唐使团入唐时间有两种说法。《隋炀帝时期“掘沟”遗址现身》一文引用专家的说法为唐开成四年(839年)。《唐代后期,如皋城已是古通扬运河重要城镇》则使用了唐开成三年(838年)的说法。

《入唐记》记载,日本国“承和五年六月,遣唐使团的一、四两船又一次出海西渡”。二十八日,大使藤原常嗣和圆仁乘坐的第一船在掘港以东的近海海面搁浅遇险。另外,《入唐记》中在圆仁一行于七月二日到达东梁丰村时十分明确地指出,“日本国承和五年七月二日,即大唐开成三年七月二日”,所以,大唐开成三年即公元838年,遣唐使团到达今如东县东部沿海是不可变更的历史纪年。